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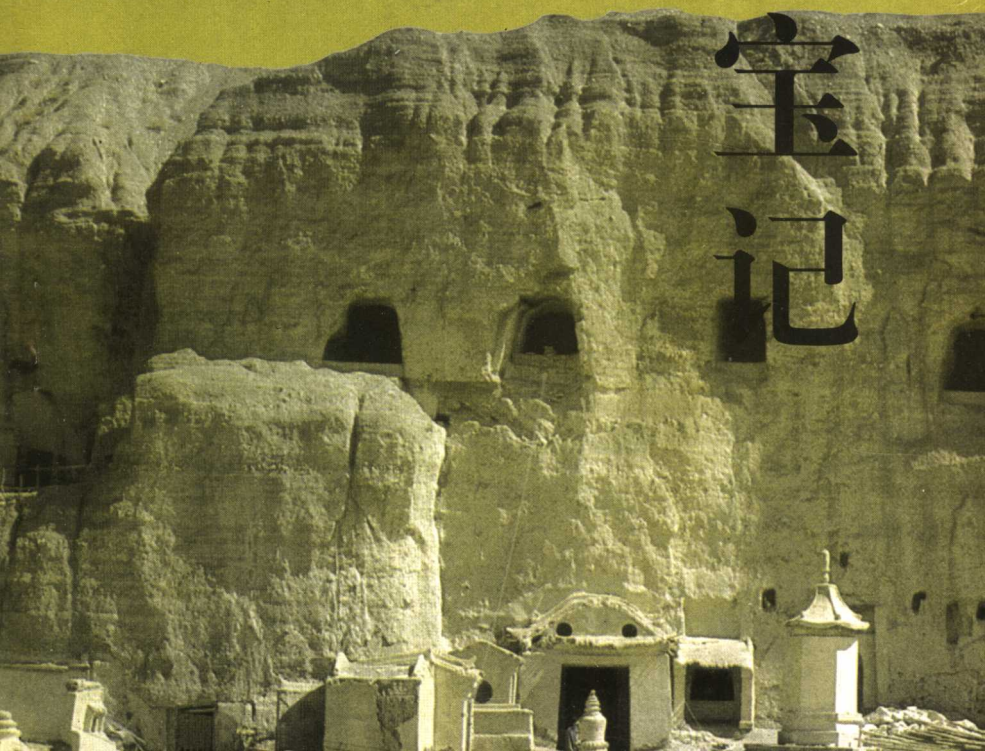
陈作义 编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敦煌 失 宝 记



敦煌失宝记

陈作义 编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泽奎

封面设计:徐晋林

敦煌失宝记

陈作义 编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

甘肃地震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插页 4 字数:169,000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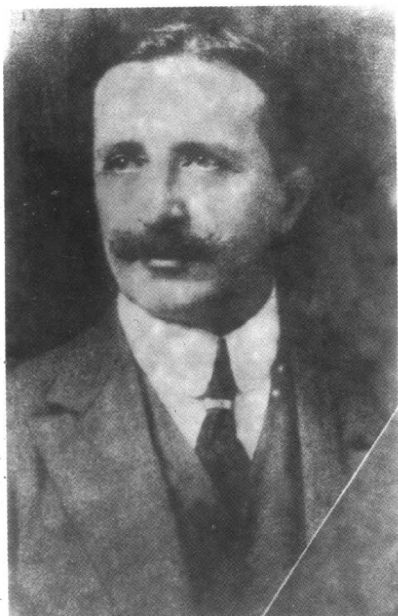
印数:1—5,000

ISBN7-226-01873-X/K·302 定价:13.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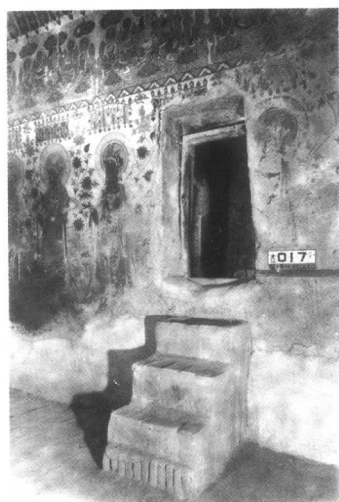


▲ 斯坦因在莫高窟与王道士的合影。(右立者为斯坦因, 左立者为蒋孝琬, 中坐者为王道士)

► 伯希和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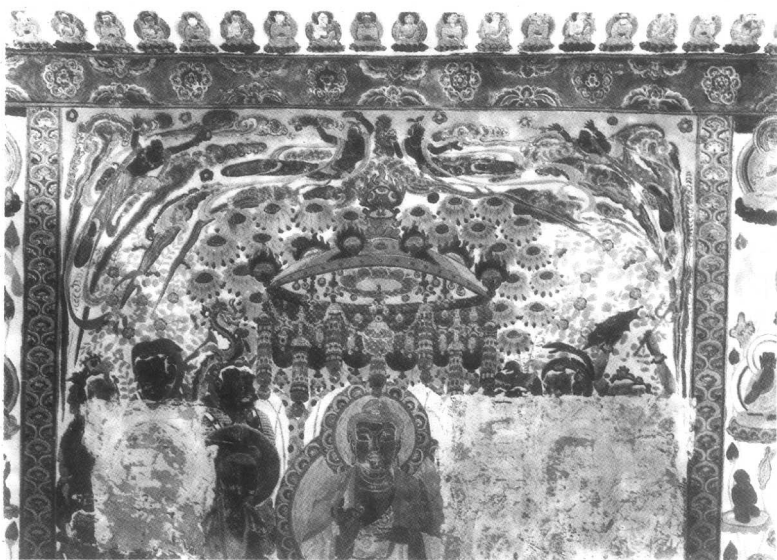


► 莫高窟藏经洞外景



► 伯希和在藏经洞自行搜查、挑选精好文卷时的自摄像





▲ 莫高窟第 320 窟被剥壁画的痕迹



▲ 被剥走的莫高窟第 323 窟壁画《迎佛图》



▲ 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单人像



▲ 剥离莫高窟壁画的华尔纳

◀ 斯坦因像



(图片均系吴健摄)

序

古老的丝绸之路衰落之后敦煌再一次吸引世人瞩目，则是由于敦煌石窟精美的塑绘和数万卷敦煌遗书、遗画被重新发现并屡遭劫难带来的。世人再次瞩目敦煌，看到了这一文化艺术瑰宝重放异彩，同时也会感到其不幸遭劫的伤痛——这两者将一同流传后世。

敦煌文化艺术瑰宝遭劫的故事，早已在中外流传。不过，各种说法不一。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桔瑞超、华尔纳等人说，他们剥离壁画，搬走塑像，骗取数万古卷是对敦煌艺术瑰宝的“拯救”和“恩德”，中国人和世界各国心存良知的人则认为斯坦因等人的行为无异于破坏和打劫。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捧上请贴万里迢迢跑到外国去请斯坦因等人来敦煌施行“拯救”，更没有乞求他们剥取壁画，搬去塑像，运走古本遗书遗画。假若某一个中国“学者”步斯坦因等人的后尘，到英国博物馆、巴黎图书馆用相等数量的银子，“买”去该馆相等数量的珍藏，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会不会像赞赏自己一样地赞赏这位中国学者呢？中国有句古训，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的几位外国朋友告诉我，外国并没有与此相反的古训：“己所不欲，专施于人”。

陈作义先生撰写的这本《敦煌失宝记》，从中外著作中搜集了

大量资料,对敦煌文化艺术瑰宝经磨历劫的往事进行了生动的再现。其中穿插记述了与此相关的人物和口头传说的遗闻轶事,更是在其他文字著作中难以见到的。记述详明,且有浓厚的实感传递;行文流畅,而在浪波涟漪的底层则积淀着沉沉的郁结。

我国已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那些散失中外的敦煌文化艺术瑰宝,是不是也有重返莫高窟的一天呢?人们希望有一天能读到另一本新著:《敦煌失宝重归记》。

李正宇

1997年7月12日

于敦煌研究院兰州分院

自序

(一)

本世纪初叶,在中国学术史和世界学术史上,发生了一件引人瞩目的大事,这便是敦煌遗书的发现与流散。同时,随着这个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崭新的学科,即“敦煌学”。

敦煌,古称沙州,坐落在千里河西走廊的最西头。这里原为游牧民族的徙居之地,自汉武帝派遣大军赶走匈奴后,它便划归为汉帝国的版图,成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举世闻名的阳关和玉门关,都在敦煌境内。隋唐以来,随着东西方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发展,敦煌逐渐成为一个繁华热闹的国际都市,因此史家称它为“华戎所交一都会”,确实是名副其实的。

商业经济的发达,为敦煌带来了文化艺术的繁荣。这里不仅出现了像张奂、张芝那样有名的文学家、艺术家,还出现了法护那样通晓 36 种语言文字的佛学家。至于未留姓名的画家和雕塑家,那就更多了。西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向东传播,敦煌恰为佛教传入内地的一个前哨,于是,东方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绽放了,这便是沙漠宝库莫高窟的开凿。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始创于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公元 366 年),

是中国开凿时间早、保存最完好的一座石窟寺。经过历代不断地经营，到了唐代，它不仅已经拥有 1000 多个绘满壁画和雕塑的石窟，而且窟外还构建了精美的檐廊和飞栈，悬空连缀，油饰彩绘，十分壮观。后来，随着海运交通的发展，这条驼铃不断的丝绸之路逐渐冷落，繁荣已久的敦煌也跟着萧条了。特别是明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修筑了嘉峪关，将敦煌弃置不顾，使莫高窟遭到很大破坏。尽管如此，敦煌莫高窟至今仍保存有 492 个石窟，它们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大小大小，形如蜂房，鳞次栉比，排列在一道陡峭的灰色崖壁之上，从南到北长约 1600 多米，因此被中外专家誉为“艺术的长廊”、“古代东方艺术的陈列馆”。

然而，敦煌所以驰名中外，“敦煌学”所以能够建立起来，除了因为有莫高窟中精美的壁画和雕塑以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本世纪初发现了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敦煌遗书。

所谓敦煌遗书，主要指的是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一大批上起魏晋，下至北宋的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佛、道、摩尼、景教和儒家的经典著作，以及一部分世俗文书和绘画作品。同时还包括古敦煌郡所辖安西、肃北、阿克赛及玉门市西部所发现的古代文献，以及外地发现的敦煌文献。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数量众多，约有四、五万件，内容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因而为“敦煌学”的创立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文字资料。

莫高窟藏经洞是怎样形成的呢？大多数专家认为，这与宋代景祐二年（公元 1035 年）西夏占据河西走廊有关。古代的敦煌，是一个扼控东西方交通的边防重镇，一向都是各种军事集团争夺的目标。只要中原势力稍一减退，就无法保有这块土地；而每经一次变乱，便会给莫高窟带来重大的灾难，使得僧侣逃离，寺窟荒芜，香

火冷落，经像受损。所以，当西夏军队逼近敦煌的时候，莫高窟的僧侣们照例又要逃难。他们在临走之前，生怕所藏典籍遭劫，因此将不能从寺庙中带走的经卷、文书、幡画、法器等，全部贮藏在一个洞窟的复室之中（即今 17 窟），外面砌起一堵墙壁，绘上壁画，使人看不出一点封闭的痕迹。西夏占据敦煌后，一霎眼便是一百多年，那些贮藏过经卷的和尚，早已不在人世了，因而藏经洞也就成了一个谜，一直无人知悉。

但据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李正宇先生考，西夏攻破瓜沙后，敦煌很快又为沙州回鹘所据，从景祐四年至皇祐四年（1037—1052 年），史有明载的沙州政权向宋廷的朝贡，就不下 11 次。西夏统治敦煌的时间只有 161 年（1067—1228 年），这比它统治河西其他地区的时间要短 32 年。加之西夏是个信仰佛教的政权，所以莫高窟的僧侣大可不必为西夏兵至而封经和逃跑。且观其洞内封存之物，有的破损，有的为译经草稿，还有的为帐单等杂物，显然是作为寺院暂时用不着的东西封存起来的，与西夏军进入河西无关。

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些被封闭起来的遗书、遗画，却在那黑暗的藏经洞中安然无恙地沉睡了八九百年。直到清代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终于因为那堵墙壁倾裂，被一个名叫王圆篆的道士所发现，千年古卷，于是重现人世。

（二）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旧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加之当时中国的现代考古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或者说还没有普及到大西北，所以半文盲的王道士和当时的大部分地方官员，对敦煌

遗书的價值毫無認識，致使這批珍貴文物流散嚴重。以時間順序來說，大體情況如下：

1900年農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文书和古画。同年，曾邀集敦煌乡紳參觀，并向歷任縣令與過往官吏有所饋贈。因缺乏原始記錄，具體數目不詳。

1902年，學識較好的汪宗翰出任敦煌縣令，看出了敦煌遺書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將此事上報於甘肅藩台衙門。此時，金石學家叶昌熾恰任甘肅學政，曾托汪宗翰代求了一部分遺書和遺画，作了初步鑑定，並補入他已完稿的《語石》一書。他建議將敦煌遺書全部運往省城蘭州保管，但因運費難以籌措，未被採納。之後，他所索得的那些卷子，不知通過什麼途徑，流散到了日本和美國。

1903年左右，王道士曾運兩箱遺書和遺画至肅州（酒泉），去巴結安肅兵備道台廷棟。廷棟以“其書法乃出于己下”為由，斥退王道士，但卻留下了經、画。民國六年，廷棟因涉復辟嫌疑，被駐防邦統周炳南槍殺，那兩箱經、画也便不知下落。

1904年，甘肅藩台衙門因缺運費，故令敦煌縣令汪宗翰查點卷子，將敦煌遺書就地鎖存起來。1905年，俄國地質學家奧布魯切夫在新疆塔城聽到了敦煌發現藏經的消息，于是從千里之外奔來，用6包袱生活用品，從王道士手中換去2包袱敦煌文獻。但據說俄國學者否認有其事。

1907年3月12日至6月13日，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一次到達敦煌，從一個定居敦煌的烏魯木齊商人扎依德·貝格納里口中，得知了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消息。3月16日，斯坦因初探莫高窟，適值王道士出外化緣，因此便去考察漢長城在敦煌一帶的延伸部分。5月21日，斯坦因帶著他的探險隊進駐莫高窟，用哄騙

手段诱劝王道士为他打开了藏经洞的门，共运走敦煌遗书 24 箱、遗画和其他艺术品 5 箱。

1908 年 2 月至 5 月，法国人伯希和因在新疆挖掘文物，听到了敦煌发现藏经的消息，于是立即赶到莫高窟。伯希和是法国汉学家沙畹的学生，又在北京使馆工作过，是个著名的“中国通”。王道士被他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所打动，允其进入石室阅览和挑选，共得遗书精品 6000 多卷，遗画 216 件。他还给 328 个洞窟作了编号和内容记录，并将其高窟壁画与塑像拍摄了大量的黑白照片，回国后选出数百幅，刊印了 6 大本，实为珍贵的图片资料。

1910 年，由于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敦煌遗书展览，中国学者始知莫高窟发现藏经之事，于是痛心疾首，奔走呼吁，要求清廷保护国宝，运回余卷。学部始责甘肃当局，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但在起运之前，已被王道士暗藏不少；运经途中，又被沿途官僚肆意瓜分，押送护兵随便私卖；抵京之后，更被京官何震彝、李盛铎等人将车接至何家停宿一夜，大肆挑选精好的古卷，悉入私人之囊。最后，便将长卷分割为数卷，以充其数。起运时的万余件卷子，到移交给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下了七、八千卷。

1912 年 1 月，日本和尚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受大谷光瑞的派遣，来到了敦煌，在莫高窟中停留了 50 多天，从王道士私藏下来的敦煌遗书中，共弄走 360 多件卷子，并带走两尊精美的塑像。

1914 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王道士一见如故，又卖给他 600 多件卷子，连同斯坦因在沿途零星收购的敦煌遗书，仍然满满装了 5 大箱子。

1914 年底至 1915 年，俄国东方学家鄂登堡与画家杜金等来到敦煌，在莫高窟中留居半年。他不仅从王道士手中弄走了二三

百件写本，并绘制了 443 个洞窟的平面图，拍摄了近 1300 张照片，透描了 2000 张左右的壁画线稿。

1920 至 1921 年，因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沙俄官兵逃到中国西北。中国当局竟将 400 多人安置于莫高窟住宿。这些沙俄军在石窟寺中留居半年，生火做饭，推倒塑像，刻划洞壁，致使大量壁画被油烟污染，众多的彩塑和壁画被肆意破坏，使敦煌艺术遭到难以挽回的惨重损失。

1923 年严冬，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华尔纳远涉重洋，从美国来到敦煌。此时，莫高窟中已无经可取，但他却被这里的千壁丹青惊得目瞪口呆，于是用一种能使壁画与墙体分离的特殊化学溶液，将莫高窟 320、321、328、329、331、335、372 等窟的精美壁画剥离 26 方，总面积达 23006 平方厘米，并带走两尊精美的塑像。1925 年春，华尔纳带领一个规模更大的“远征队”，再次来到河西走廊，企图将敦煌所有的壁画都“拯救”到美国去，但因当地人民已经奋起捍卫莫高窟及河西各地的艺术宝藏，他只好空手而归。

敦煌遗书总数约为 4 万至 5 万号，遗画约 1000 件左右。据专家们统计，在敦煌遗书中，汉文卷子约为 36000 余号，其余均为少数民族及古代各国文字的文献。目前，敦煌遗书主要收藏在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在中国收藏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共有 8600 余号，同时还有英国和法国收藏的 10000 余卷缩微胶卷。此外，台湾收藏 150 号，敦煌研究院收藏 700 号，敦煌市博物馆收藏 300 余号，上海、南京、合肥、兰州、酒泉、高台、西宁、济南、天津、成都、沈阳、乌鲁木齐等地，也都有零星收藏。

在国外，英国伦敦收藏约 11000 余号，法国巴黎收藏约 6600

余号，俄罗斯圣彼得堡收藏约 18900 余号，日本收藏约 1000 余号。另外德国、丹麦、朝鲜、印度、瑞典、奥地利和美国，也都有数量不同的收藏。

至于敦煌遗画，则主要收藏在英、法、俄三国。据已经公布的数字，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 536 件，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 216 件，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 300 多件。此外中国、印度、美国、日本、朝鲜等国也有收藏。敦煌遗画中，约有 60% 为绢画，其他为麻布画、纸画（包括白描、木刻）以及刺绣等，从有确切年代题记的绘画来看，它们都是公元十世纪以前的作品，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可说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

世界各国的史学界，对敦煌遗书和遗画都十分重视，不少国家设立了专门机构，进行整理和研究，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敦煌遗书和遗画的流散海外，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国家主权受到侵犯的象征，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当永志不忘的奇耻大辱之一。这是历史事实，谁也无法改变它的历史性质。但是也应该看到，它对推动各国专家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促进全世界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历史事实，谁否认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三)

这本小册子里收录的三篇纪实性文章——《敦煌失宝记》、《敦煌遗画录》、《于右任西行访画记》，都是近年来发表于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旧作。文中叙及的所有事件，均以历史资料及中外专家的研究材料为依据，同时还吸收了一批作者在河西走廊所得的民间口碑资料，没有随意虚构的事件，所以，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本史

料性的作品。

有关敦煌文献和敦煌艺术的研究，专家学者们已经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及学术专著，真可谓汗牛充栋，多不可计。但是，大部分论文和专著都是为了揭示某种学术观点，阐明某些深奥的道理而写的，加上文中专用术语较多，一般读者不但不容易看懂，而且也没有时间去仔细研读，这就影响了敦煌学的普及，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敦煌文献和敦煌艺术的了解。而本书的作者，则企望用浅显易懂的文字，略带故事情节的叙述方式，将敦煌文物的发现和流散，以及围绕这个问题而涉及的其他情况，讲述给不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工农群众、一般干部和广大青少年读者，这就是在某些章节中略带了一点文学色彩的原因。事实上，这个目的基本上达到了。三篇文章在报刊上摘要发表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不少同志来信建议汇编出版，还有的同志甚至建议大胆展开情节，着力塑造人物，将此改写成一部记实性历史小说，以便更好地再现那个历史时期的那些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

本书所选的三篇文章，在这次汇编时程度不同地作了一些修订和补充，特别是《敦煌失宝记》一文，三易其稿，补充较多。这主要是因为，一是当初撰写文稿时，作者掌握的资料不充分，有许多重要的材料没有写进去；二是当时依据一些报刊上刊登的零碎材料，将个别事件中的个别材料，甚至弄错了；三是由于报刊版面有限，不允许写得太长；四是当时未敢将听到的民间传说写进去，怕影响了史料真实性。但在这次修订和补充中，并没有将它们改写成随意虚构的记实文学，仅只加入了一部分蕴藏在河西群众中的口头传说，仍不失为经过整理的史料作品。

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